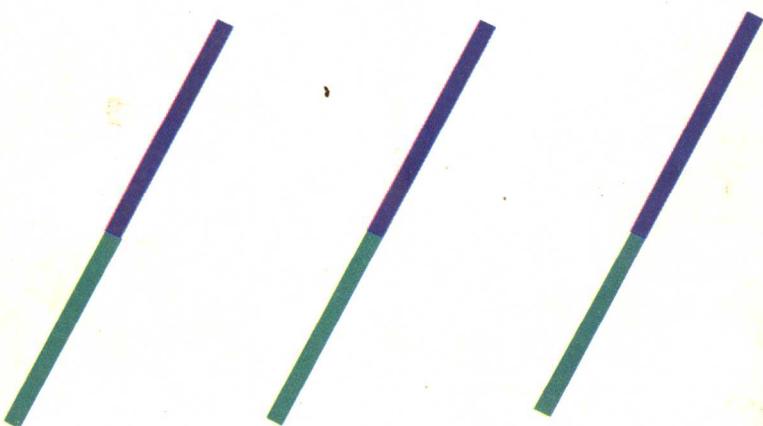


《文哲學叢刊》

索探的學哲與化文

著先述劉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劉述先著

文化與哲學的探索

臺灣通志
臺
書局印行

文化與哲學的探索／劉述先著--臺北市：臺灣學生，

民75

14,360面；21公分--（文化哲學叢刊：3）

新臺幣300元（精裝）--新臺幣250元（平裝）

1.文化-哲學 劉述先著

541.201/8777

文化與哲學的探索 全一冊

著作者：劉述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業字第1100號

發行人：丁文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18號

電話：三三一四一五六三二一一〇九七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
座
電話：三一八〇五八〇七

定價 精裝新臺幣三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二五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初版

自序

去年（一九八四年）我答應學生書局編一本文集，裏面收入一部分從未在臺發表過的文章，想必會引起讀者的興趣，書名就叫做：《文化與哲學的探索》。原定的第三部分為：「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困境」，總共選了七篇文章，那知後來臨時決定原定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單行出版，這一部分沒有可能單獨出書，因為分量差得太遠，必須另選材料，重新編過才行。但我在這一年內忙得不可開交，根本無暇及此，一直到最近才找到時間做這一件事情。連同以前的七篇東西，我一共選了二十篇文章，次序也重新編排過。現在仍然分為三個部分：

(一) 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困境。

(二) 比較哲學信息的追尋。

(三) 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探索。

在第一部分之中，我保留了原來選的頭五篇文章，次序也沒有變動。另外加上了一篇：「哲學教育改良芻議」，這是現在的第一部分的內容。而呂武吉的訪問稿與「從民本到民主」這兩篇文章，則挪動到現在的第三部分去。以此，我的序言除了保留原來的小部份內容之外，也得通盤改寫過。照現在的安排，除了第一部份只有六篇文章以外，第二與第三部份

都各有七篇文章，現在就讓我來簡略地介紹這些文章的內容，以及整本書的組織結構。

在第一部分所收的六篇文章之中，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就叫：「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在文中我用錢學森、馬思聰、老舍、郭子加等具體的例證來說明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境。

在這樣的困境之下，中國的知識份子並沒有絕望，他們以一種嚴肅的心情要為國家民族文化的前途，世界哲學的危機探求一條出路。在這樣探索的過程中，心理的負擔不免過重，有時不免發為過分激越之辭，以至文化論戰不幸演變而成為文化罵戰。我在香港《大學生生活》發表「文化論爭的回顧與批評」的兩萬字長文，是應編者所請，對於一九六一到六三兩年間在臺發生的文化論戰的述評。這篇文章照顧得比較全面，文字寫得富有趣味性，據說當時為雜誌的銷路增加了一倍。但不巧的是，現在早已停刊的《大學生活》在當時不能進口，所以在臺讀者只能由引文之中看到一鱗半爪，缺少機會一窺全豹。如今雖然事過境遷，重印此文，仍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回顧。

如果說在臺的學者還感覺到學術空氣的窒息的話，那麼在大陸經歷過文革的慘禍被鬪得死去活來的中國學者的感受就更不可以同日而語了。一九八一年在杭州舉行宋明理學會議，破天荒地請了海外的學者回去參加。懷着極端複雜的心情，我去參加了這一次歷史性的集會。由於與會的幾位海外學者多不習慣聽南腔北調的方言，也不像我那樣習慣於用中文寫作，出來之後只有我寫了一篇全面性的報導。據說這篇文章在大陸的中國哲學界產生了很大

的震盪。在文中基本上我肯定了中國學者對於學術的真誠與努力，但無保留地否定了辯證唯物論的框架。我發表這篇文章時只想到我所要付出的代價是，永遠不再會有機會，回到自己祖國的土地去訪問了。那知後來海外回到大陸訪問的學者帶回來的消息卻令我大出意外。有些大陸的學者竟然坦白承認，我對他們的批評恰中要害，這倒有些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我終於想通了：原來大陸學者最怕海外回去的「歌德派」胡亂吹捧一通，給他們造成了許多不利的後果；只有海外的學者善用容許給他們的自由，不去做沒有骨氣的應聲蟲，豁了出去，仗義執言，這才能夠替大陸學者說出一些他們內心想說而不敢說出來的話，為他們稍稍破除一些條條框框的限制，爭取到些少合理的權益；這樣也才不至於受到自己的學術良心的責難。

奇怪的是，正由於我的坦白直言，反而幫助我在國際學術會議上，與大陸出來的學者建立了一種純粹的學術上的關係與友誼。在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檀島舉行國際朱子會議，海峽兩岸的學者有了初步的接觸與交往，前年（一九八三年）在蒙特利爾舉行第十七屆世界哲學會，彼此又有了進一步的對話與論辯。我在「蒙特利爾世界哲學會紀行」這篇短文中有一簡單扼要的報導。大陸學界經過文革的打擊之後顯然處處落後，如今正在逐漸復甦的階段之中，自由世界的學者與他們打交道，盡可以理直氣壯，不會有任何自卑感。而要把真正的學術引進大陸，這正是我們對中國未來一線希望之所繫，不可因意識型態的僵固而切斷了兩方面在學術交流上面的連繫。

但今日我們要面對的嚴重問題，還不僅在我們自己學術界的不上軌道，老是建立不起客觀的標準，世界哲學在近年來也展現了一種危機。此中所牽涉的問題，在我與聯合報副刊編者對談的紀錄——討論「當前哲學的危機」的短文中，有一簡要的概述。美國近年來已經感覺到人文教育的日趨下游，造成了整個教育的危機，哲學界更在積極尋求因應之道。我對當前哲學應有的改革有一些想法，也有一些建議。「哲學教育改良芻議」一文在臺港兩地發表，並沒有得到很多反響，這是一個徵象，要脫離目前的困境，還有待於不可預見的未來。

第二部分的主題是比較哲學信息的追尋。中國在過去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但到現代則無疑是墮落在西方以後，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往西方去追尋。即使是當代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也是因為由康德、黑格爾處吸收了新的資糧，才能夠突破傳統的窠臼，打開了舊時代的經生家所夢想不到的視域。我在六十年代到美國去留學，有幸得列魏曼教授 (Henry Nelson Wieman) 的門牆。在我出國以前，幾乎對於當代西方的神學與宗教哲學一無所知，而魏曼也對中國的哲學思想沒有什麼認識。但我感到他的思想的信息與我們「生生」哲學的傳統息息相通，卻是用一種完全現代的方式表達出來。兩年之間，我們有不少「創造的交流」 (Creative interchange) 的機緣。由一個比較的觀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傳統與現代分別的優點與限制。一九八四年八月南伊大有盛會慶祝魏曼教授的百年誕辰。我因要赴臺參加第一屆世界中國哲學會議，所以不能與會。但我撰文論「魏曼和中國

「哲學」，中文版發表於紐約出版由《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擔任主編的《知識份子》創刊號，文字稍有改易，這裏仍照我的原稿發排。另外我檢出一九六六年所寫的一篇短文：「魏曼教授的思想與人格」，以及他的自傳的譯文，也一併印在這裏，作為了解他的思想的背景。

柯普斯頓 (Frederick Copleston) 以他英文著述的九大卷的《西洋哲學史》聞名於世。他和魏曼的情形不同，魏曼對於東方哲學毫無興趣，柯普斯頓則參加了一九六九年在夏威夷舉行的第五屆也即最後一屆的「東西哲學家會議」。但仍然令我詫異的是，一九八〇年他應邀作「吉福特講座」(Gifford Lectures) 竟然講「宗教與一」而以「東西哲學」為副題，我所沒法想像的是東方哲學在他的思想之中會佔這樣大的比重。令人感到難能可貴的是，柯普斯頓是位神父，但他對古往今來各種流派的哲學都嘗試用客觀平情的態度來了解。就當代來說，他既和分析哲學展開對話，也兼及歐陸存在主義一類的哲學，後來更擴大範圍到東方哲學的大傳統。他的態度是極審慎、非獨斷性的，一貫採取低姿，但仍然提供了一個比較哲學的大架構。我寫「柯普斯頓論宗教與一」一文，討論了柯普斯頓的睿識與其限制所在。

由一九六六年我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擔任教職開始，由於職業的需要，與同行的學者交流，每年總得參加兩三次會議，像美國哲學會中西部的年會，亞洲研究協會的年會，以及其他特別的會議，像六九年的東西哲學家會議之類。但我從來對於開會並不很熱衷，只是採取一種中庸的態度。由一九八一年起擔任中文大學的哲學講座以來，因為地區偏遠，旅行費時，不是有必要，並不隨便出去參加會議。我自己的原則是，一定要提出論文，言之有物，

與我自己的興趣有密切的關係，這才答應與會，否則一概予以謝絕。那知由去年暑假到今年暑假，雖然辭謝了好多次邀請，結果仍然參加了一連串的會議，而且自己也負責組織了兩次國際會議，十一月間還要回臺大參加為慶祝母校四十周年校慶而舉辦的國際哲學會。我自己不得不解嘲，戲稱一九八五是我的開會年。但自己的確努力用中英文寫了好幾篇論文和報導，相信時間和精力沒有浪擲。而且有些特別組織的會議實在很有意思，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由這部集子裏所收的好幾篇文章之中可以看得出來。

其間倒是有一個有趣的插曲值得一記。去年西德漢斯·孔 (Hans Küng) 教授寫信給我，說由秦家懿教授 (Julia Ching) 的介紹，希望我為一個歐洲的國際神學雜誌 *Concilium* 寫一篇由中國的觀點看耶教的信息的文章。我回信給他，實在抽不出時間寫這篇文章，但若到今年三月在中文大學開過了國際哲學會之後，他還找不到適當的人的話，可以再寫信回來一試。等到我為諸事忙碌，已把這事淡忘之後，那知就收到他的來信，由於種種原因不湊巧沒找到人，仍盼我勉為其難為他們的專號（「世界宗教與耶教」）寫這篇文章，免得缺少了一個重要的環節。我只得利用短暫的時間空檔，把文章用英文寫出來寄給他。不想他十分欣賞這篇文章，寄了他的書和文章回報，倒是我的一個意外收穫。這篇文章並譯成德文、法、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以及荷蘭文同時發表。漢斯·孔是世界聞名的天主教神學家，他的說法不為教廷所容，竟然逼他辭去講座。照《時代》雜誌的報導，他最後一次演講，有成百上千的人在教室外面聽他的播音演講。我是在這件事發生以前，他的學人團體途經香港去大陸

時見過一面。我由中國的觀點對於耶教的信息有相當坦誠的批評，他不只不以為忤，反而予以讚賞。將來世界各哲學宗教信仰間的對話必定要依靠一些有廣大胸襟以及自由思想的人的努力，而這樣的潮流不是一些思想僵固的死硬派所能堵塞得了的。湊巧今年上半年湯一介、樂黛雲夫婦兩位教授先後來中大訪問，爲了《國學集刊》創刊號向我索稿，我就答應把此文的中文版寫出來交他發表。顯然這是一篇由比較的觀點寫出來的文章，然而集刊遲遲未能出刊，故在海外先由八九十年代《發表》。

無疑，今年三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國際哲學會是有強烈的比較意味的，主題是：「和諧與爭鬭」。這是中大哲學系有史以來舉辦的最大的一次國際哲學會議。我們的目的是要辦一個真正的哲學會議，而不是一個漢學會議。故此我們的論文可以先各講各的，最後才互相交流切磋。這個策略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參加的學者來自四大洲：歐、美、澳、亞、海峽兩岸都有代表參加。最突出的個例是名滿天下的阿培爾教授 (Karl-Otto Apel)，他非常熟悉歐陸的解釋學和英美的分析哲學兩個大傳統，對於中國哲學的了解則是十分有限。他是第一次參加這類性質的會議，爲他的視域又打開了一個新的向度，而他也對大會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其餘來自海外提論文的學者也多是一時之選，如韓立去 (Dieter Henrich, 慕尼黑、哈佛)、史密士 (John Smith, 耶魯)、中村元 (日本) 等，華裔學者與我們自己的同事則提供了有關中國哲學，包括儒釋道等不同的觀點。會後我寫了一篇一萬字長的「剪影」，對於這個十分特別的會議，有相當詳細的報導。

從我青年時代開始弄哲學，就一向採取比較的觀點。在大學讀書時，曾經深深受到方東美先生的影響，所以這次母校校慶的國際哲學會，我毫不猶豫地選了「比較哲學」這一組。我的論文是上個星期才脫稿的。正如我在文章一開始時就說明的，這不是一篇一般性的學術性的論文，乃是一個長期從事比較哲學的工作者在探索的過程中，感受到一些問題，也有一些親身的體證與個人的意見，願意借母校創校四十周年紀念這樣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場合，在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上提出來，與大家一同切磋。這篇文章討論了方法論的問題，並舉了兩個實例說明——有關宋明儒學以及有關科學、民主、現代化的比較研究，這就直接關連到第三部分的主題：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探索。

有關傳統和現代化的問題是沒法子加以單純的處理的。據說殷海光先生在出國訪美之前是一位狂熱的西化派，去了美國短短一段時間之後，在通信報導之中卻宣稱，美國竟找不到像他自己這樣的思想家。由此可見，我國的學者實毋需用其自卑。在今天這個偉大的轉型期間，客觀學術傳統的建立固然刻不容緩，在這方面我們自必須要向西方學步，急起直追。但更重要的卻是哲學睿識的探索，在這一方面，我們的覺醒，以及對於問題的迫切性的感受，可能由於近二百年來民族經歷的內憂與外患所造成的苦難遠勝於西方的關係，甚或還超越過西方。

美國哲學的危機與我們根本不同，由於社會長享太平，哲學研究不覺竟然走進象牙之塔裏面去，晚近才有必須改弦更張的呼喚。我們卻從來沒有得到半點喘息的機會。多少年來我

一貫相信，必須要改造傳統，與現代結合，前途才能顯現一線曙光。新加坡大學高級講師呂武吉博士在蒙特利爾給我做了一次訪問：「談儒家傳統與現代化」，這篇訪問稿可謂指點了我自己對於這一個問題思考的方向。

溫故以知新，我們必須掌握傳統的精義，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才知所取捨；那些是傳統之中已經死去的部分，那些是傳統之中具有萬古常新的意義的部分。我把「宋明儒學的特質與其現代意義」一文選在這裏，正是為了這個目的。宋明儒學相對於先秦儒學而言可說是開創了一種「新儒家」的思想。這樣的思想是宗奉儒家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受到由印度傳入的佛家思想的重大衝擊之後的一種回應，那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傳統的一種文藝復興。

但是，不幸的是，中國文化進入現代還要經過一次更嚴峻的考驗。滿清入關以後，由於種種原因，對於西方採取了一種閉關自守的政策。結果正當西方的科技突飛猛晉，產生了工業革命之際，中國卻一任其舊，以至造成了一個積弱落後的局面，由上個世紀以來，飽受帝國主義的侵凌，幾乎有亡國滅種的危險。而儒家思想似乎在清初便已慢慢喪失了它內在的生命，戴震曾強烈反對宋儒以理殺人；到了二十世紀初年，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更以打倒孔家店為職志，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儒家的思想還有復興的希望麼？抱殘守缺之輩，在新思潮的衝擊下，顯得蒼白無力，舊勢力像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打倒。然而也有少數有識之士，一方面企圖衛護傳統的睿識，另一方面也願意與時推移，推陳出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更新自己文化的生命。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當代新儒家的思想乃應運而生。

我寫「當代新儒家的探索」一文，是應老友傅偉勳之約，爲他主編的《二次大戰後世界宗教運動》寫有關新儒家的一章。事實上當代新儒家究竟包括那些人物，至今並無定論；他們彼此之間的意見也很分歧，莫衷一是。爲了方便起見，我把注意力只放在哲學方面，選了四家：熊十力、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介紹了他們後期的思想，並加以批評反省，指點了對未來展望的方向。這篇文章先以中文起草，然後才寫成英文。中文版發表於《知識份子》一九八五年秋季號，這裏文字有少許改易，故仍照原稿發排。

香港的《百姓》出了一本集子：《生命的奮進》，選錄了當代新儒家幾位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四位先生的作品，大體是有關他們學思過程的自述，寫得比較生動活潑，對於熱心向學的青年人最有益處。我爲這部小書寫了一篇序言，爲了某種原因，在出版時刪削了二百多字。現在重印此文，也照原稿發排。

從去年十月起，我開始擔任新加坡成立不久的「東亞哲學研究所」的學術顧問職務。近年來，新加坡大力提倡宣揚儒家倫理，決定在中學教這一門課程，作爲六七個世界宗教科目的選項之一。在海外學者余英時、杜維明兩位教授的幫助之下，編寫了中學三四年級的教材，討論了君子的楷模，仁義禮智的德目，大學、中庸的文獻，儒家的人性、自然、政治、歷史、藝術的觀點，以至內聖外王、天下大同的理想。但卻語焉不詳，教師也缺乏適當的參考資料，所以我提議邀請當地和海外的學者對於這樣題目作深入淺出的解析，將來出版論文集，對於各方面都有益處。會議引起當地報紙、電視、電臺的重視，也引起了許多猜測，我

寫了一篇一萬字的長文報導這一次會議，新加坡這種企圖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實驗是值得我們密切加以注意的。

我個人一貫的看法是，在改造傳統走向現代乃至現代以後的過程中所碰到的困難是不可以輕忽過去的，思想意識型態上的阻礙更是極端地難以克服。一九八二年七月底中國時報邀請了海内外共十九位學者在宜蘭的棲蘭山莊開會，主題討論「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探索」。那幾日正好遇上了颱風，對外交通一度斷絕，晚上沒電，點上了蠟燭，連同到會採訪的記者與工作人員一共二三十個人，大家擠在會議室內，日以繼夜地開會，嚴肅地討論問題。我宣讀的論文：「從民本到民主」，指出中國過去只有民本思想，缺乏民主思想，從民本到民主需要經過一個極端困難的脫胎換骨的過程。我的文章所傳達的澀味正和外在惡劣的氣候互相配合著，這實在是一個令人畢生難忘的經歷，然而最後終於風止雨息，我們無意外地安全回返到文明的懷抱。由此而令我得到了一項啓示：只有真正不閃避地認識到我們的困境，才能夠探索尋覓到契機，來超越克服我們的困境。

最後一篇短文：「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嚮往」，是我應香港《百姓》半月刊編者之請，對於三周年紀念特輯所定專題：「甚麼是中國國情」和「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一個回應。事實上我並不特別喜歡「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這樣的字眼，它指向一個崇高的理想，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一類的詞彙已被濫用乃至曲解成爲衛護一些反動的、罔顧人權的、強姦民意的做法的藉口。我們在棲蘭山莊的討論會上便已清楚地覺察

到了這樣的危險。我們必須明白肯認，「民主」意指現代西方式的建立了三權分立、投票選舉制度的民主；「社會主義」旨在防範資本主義、特殊集團勢力的過分膨脹，而要照顧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中國式的」是要順應中國本身的國情，找到實際可行之道來實現這樣的的理想。總結來說，是要建立一個比較合理的制度，讓個人能夠自由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體現自己的生命內在本具的價值。這一條道路是艱難而遙遠的，講起來真有點像是烏托邦的幻想。但潘杜拉的匣子裏最後跑出來的就是只有極微弱的呼聲的「希望」，在它的鼓舞之下，只要人類一天不滅絕，在未來的成就仍可以是無限量的。

一九八五、九、十六改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八六、六、六定稿

文化與哲學的探索 目錄

自序

第一部 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困境

一、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困境.....三〇

二、文化論爭的回顧與批評.....一三

三、中國大陸哲學界的兩難局面.....五一

四、蒙特利爾世界哲學會紀行.....八一〇

五、當前哲學的危機.....九五

六、哲學教育改良芻議.....一〇一

第二部 比較哲學信息的追尋

七、魏曼與中國哲學.....一一一

附錄：魏曼教授致作者英文原函三件

八、魏曼教授的思想與人格	一三七
九、魏曼：「我的理智發展」	一四三
十、柯普斯頓論宗教與……	一六三
十一、由中國哲學的觀點看耶教的信息	一七七
十二、香港中文大學國際哲學會剪影	一八九
十三、有關比較哲學研究的一些批評反省	二〇五
第三部 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探索	
十四、訪劉述先教授談儒家傳統與現代化（呂武吉）	二三一
十五、宋明儒學的特質與其現代意義	二六一
十六、當代新儒家的探索	二七九
十七、《生命的奮進》序	三〇九
十八、新加坡的儒家倫理研討會	三一五
十九、從民本到民主	三三三
二十、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嚮往	三五七